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“玄游”“仙游”文化

范能船

“玄游”、“仙游”是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相适应,与当时的哲学观念、审美理论相适应的二种新型旅游形式(这期间还有被称之为“释游”的一种旅游形式)。这种新型的旅游,与秦汉旅游不同,没有万里漫游的宏伟氛围,也没有万里巡游的恢宏气象;有的是哲学、宗教的抒情色彩和投身山水、净化心灵、超脱凡尘的氛围。可以这样说,其意义在于表明,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中国人自觉地走向自然,要比西方人早得多。

(一)

玄游。玄,本来是指道家精深奥妙的哲理。出之于《老子》所谓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(一章)。后来,人们把魏时由王弼、郭象等人倡导的以老庄思想为本的哲学也称之为玄学。玄学论有无,折名理,主清静,重自然,强调万物一体,师友造化。当时的文人,不管出身势族或寒门,皆漠视俗务,清谈玄虚,适意自然,钟情山水,形成了一种旨在参悟玄机、印证玄理和陶冶人的自然之情、自然之性的游览山水的风尚。这种旅游称之为玄游。

玄游之风,起于正始。由于当权的司马氏家族党同伐异,弄得正直的官吏和读书人朝不保夕,处境十分险恶。他们思慕老庄,研究玄学,日以玄谈为荣,以玄游为尚,以山水为友。据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记载,名闻遐迩的阮籍、嵇康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、山涛等,年轻时相见恨晚,常常千里聚会,联袂出游,于

碧绿幽静竹林里肆意酣畅,热衷玄谈,时人誉为“竹林七贤”。此七贤又以阮籍、嵇康的游风最具特色。同为玄游,阮籍举止狂放,嵇康意态悠闲,又具不同特色。据《晋书·阮籍传》记载,“籍本有济世志,属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名士少有全者,籍由是不与世事,遂酣饮为常”,“博览群籍,尤好庄老”,“傲然独得,任性不羸”,“或闭户视书,累月不出;或登临山水,终日忘归。”且行迹怪诞,游踪飘忽,“时率意独驾,不由径路,车迹所穷,辄恸哭而反。”他的玄游,仰观宇宙,俯察人生,肆意感慨。“尝登广武(河南荥阳),观楚汉战处,叹曰:‘时无英雄,使竖子成名!’”据《晋书·嵇康传》记载,嵇康“天质自然”、“恬静寡欲”、“长好老庄”、“常修养性服食之事。”所以他游于山野往往手执药锄,腰悬药篓,口尝药草,所谓“采药游山泽,会其得意,忽焉忘反。时有樵苏者遇之,咸谓为神”。嵇康还喜欢结交隐居深山的道士,与之讲玄论道,同栖同游。“至汲郡(河南新乡)山中见孙登,康遂从之游”、“康又遇王烈,共入山”。嵇康自己写的《赠秀才入军》(第十四),“息徒兰圃,秣马华山。流磻平皋,垂纶长川。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,游心太玄。嘉彼钓叟,得意忘筌。郢人逝矣,谁与尽言。”这首诗是想象其兄长嵇喜行军各地、休息时领略山水乐趣的自得情景,也正是嵇康意态悠闲游风的写照。西晋,政治更黑暗,玄风也越炽;所以追步阮、嵇玄游山水的名流也越多,王衍、张华、伊籍、陆机、潘岳等等,史籍中都屡见不鲜,诗文中也有许多反

映。东晋半壁山河，偏安江南，大批南渡之士和土著缙绅，更玄心勃勃，于南国山水中参玄悟妙，咏吟长啸；其中著名的有谢安、王羲之、孙绰、陶渊明等。最著名的是王羲之。据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记载，王羲之刚从中原避难江南，就喜欢越中会稽的绿山青水，“羲之雅好服食养性，不乐在京师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终焉之志。会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谢安未仕时亦居焉。孙绰、李充、许询、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，并筑室东土，与羲之同好”。最值得首定的是，王羲之首创的兰亭游集，这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玄游集会。“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”，“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”，王羲之带领着右将军司马太原人孙函公、前余姚县令会稽人谢胜四十一位官员、名士，在这儿“流觞曲水”、“一觴一咏”、“畅叙幽情”、“游目骋怀”，并写下流芳百世的《兰亭集序》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在文中抒发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的看法，跳出了传统的以为死生一体、寿夭无别的老庄思想的巢臼。王羲之离开官场后，“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，弋钓为娱。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，采药石不远千里，遍游东中诸郡，穷诸名山，泛沧海”，可谓东晋最著名的玄游家。他对旅游文化的重大贡献，还表现在“线的艺术”，即书法艺术方面；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书法大师。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称其“尤善柸书，为古今之冠，论者称其笔势，以为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。”梁武帝（肖衍）评其书法曰，“王右军书字势雄强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风阁”（《书法钩玄》卷四《梁武帝评书》）。唐太宗（李世民）评其书法云，“观其点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烟霏露结，状若断而不连、凤翥龙蟠，势如斜而反直”（《书法钩玄》卷四《唐太宗书王右军传授》）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欢赞其书法：“千变万化，得之神功，自非造化发灵，岂能登峰造极？”（《书法要录》卷八《张怀欢书断中》）其实，王

羲之书法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、“如龙跳天门，虎卧风阁”、“烟霏露结”、“凤翥龙蟠”，是和他酷爱“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、“清流激湍”的山水审美观念和情趣分不开的，他曾感叹地说：“我卒当以乐（指纵情山水）死。”（《晋书·王羲之传》）；也是和他自觉或不自觉运用“线的艺术”师法雄奇的自然山水密切相关的。山水陶冶了他的情趣，山水熔铸了他的意志，山水形成了他的气质，山水也启迪了他的书法艺术。孙绰是东晋最有名的一位擅长在玄游中创作一种以山水景物开篇，以玄学微言作结的玄言诗人，实是后来山水诗的前兆。如他的《兰亭诗》：“流风拂枉渚，亭云荫九皋。莺语吟修竹，游鳞戏兰涛，携笔落云藻，微言剖纤毫。时珍岂不甘，忘味在闻韶。”前四句描绘景物的美妙，后四句阐明参玄的快乐，即表现用山水点缀玄言的特点。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田园诗人，据《晋书·陶潜传》记载，“未尝有所造诣，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”；可见其是只近游不远游的玄游家。他曾攀登庐山、找慧远和尚与陆修静道士谈天说地、交游论玄。南朝宋齐时，玄风虽继续，但已逐步淡化；人们在玄游中，固然清谈玄理；但更主要的是追求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，谢灵运、谢朓即为著名代表。谢灵运是魏晋南北朝最著名的卓绝玄游家。据《南史·谢灵运传》记载，“……出为永嘉太守。郡有名山水，灵运素所爱好。出守既不得志，遂肆意游遨，遍历诸县，动踰旬朔。理人听讼，不复关怀，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”。一年后，他干脆“称疾去职”，堂弟劝阻也不听，回到会稽乡间经营自己山庄别墅，“傍山带江，尽幽居之美”，“与隐士王弘之、孔淳之等放荡为娱，有终焉之志。”不久，宋文帝调他回京做秘书监，他又“多称疾不朝直”，常“出郭游行，或一百六七十里，经旬不归。既无表闻，又不请急，”且“灵运表陈疾，”故“赐假东归。”此后，“与族弟惠连、东海何长瑜、颍川荀雍、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，共为山泽之游，时人谓之四友。”为玄

游山水,他不惜动用祖传产业,“凿山浚湖,功役无已。”他“寻山陟岭,必造幽峻,崖嶂数十重,莫不备尽,”为登山而专制“登山鞋”,“登蹻常着木屐,上山则去其前齿,下山去其后齿,”为此后代人常念及此举,如李白曾云:“脚著谢公屐,身登青云梯”(《姥游天姥吟留别》)。尤为后人传为佳话的是,“尝自始宁(今浙江绍兴)南山伐木开径,直至临海(今浙江临海),从者数百。临海太守王琇惊骇,谓为山贼,未知灵运乃安。”无怪乎大诗人李白常追念之,“谢公宿处今安在,绿水荡漾清猿啼”(《姥游天姥吟留别》)作为我国中世纪最有影响的旅游家,谢灵运对旅游文化的最大贡献是,创作了大量以山水为题材的山水诗,奠定了我国山水诗发展的基础。他的山水诗,巧构形似,富丽精工,诚如钟嵘所评,“然名章迥句,处处间起;丽典新声,络绎奔会,譬犹青松之拔灌木,白玉之映尘沙”(《诗品》),又诚如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引鲍照语,“初发芙蓉,自然可爱。”由于谢灵运的奠定,才出现了刘勰所言的“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;庄老告退,而山水方滋。伛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;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”的饶有生机的局面。南朝梁、陈时,钩沉玄理、印记玄学的风气更为淡化,而更重视山水美的描绘。当时山水游风愈盛,山水游客愈多,如吴均、庾肩吾、何逊、阴铿等等皆是;不过,他们的旅游,因更多对山水的审美鉴赏,而已不属玄游范畴。

(二)

仙游。仙,成仙。仙游是人们追求成仙而辗转奇山异水的一种旅游活动。仙游的产生与道教密切相关。道教产生于东汉,成熟于南北朝。道教徒所追求的是长生不老,乃至“羽化而登仙”。要实现这个目标,只有两个办法。一是养气服食。所谓“入真道者,先须保道气于体中,息元气于脏内;然后辅之以药物,助之以百行,则能内愈万病,外安万神”

(《云笈七签》卷五十六《元气论》)但要养气服食只有寻觅奇山异水(服食灵丹妙药只有自己采集、配制、冶炼、煎熬)。二是仙人点化。虽说省去了养气服药的许多麻烦,但要找到神仙并非易事;必须要深山幽谷、洞天石府、僻静海滨、遥远孤岛上仙游寻找。这种仙游有两个特点。从审美客体而言,不是一般青山绿水,必须是环境幽深,形状奇特、云雾缭绕、波涛无涯、气势刚健、氛围深邃、草木丰润,并且要有神迹仙踪,总之审美客体必须是具备仙风道骨的自然山水。从审美主体而言,不再像秦汉时只局限于神仙家、方术之士或秦皇汉武极少数人范围,而随着道教的兴旺以及影响的扩大,呈现出一定的广泛性。不但入道者,如道长、道童等信徒,醉心于道游,在僻静幽静的山水中游览、修炼;而且许多慕道者,如文人墨客、宦海官吏、平民百姓,于高山深谷、波涛孤岛中寻寻觅觅,以求得羽化。当然在众多的仙游人群中,文人士载入史册较多,其中最负盛名的仙游家有葛洪、陆修静、陶弘景等。

葛洪为了搜集道教的神术仙方,曾经广游大江南北,于徐、豫、荆、襄、江、广数州之间,访奇山异水,交道教朋友,得到了许多秘籍。据《晋书·葛洪传》记载,“时或寻书问义,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,期于必得,遂究览典籍,尤好神仙导养之法。从祖玄,吴时学道得仙,号曰葛仙公,以其鍊丹秘术授弟子郑隐。洪就隐学,悉得其法焉。”他八十一岁过世,《晋书·葛洪传》说其“视其颜色如生,体亦柔软,举尸入棺,甚轻,如空衣,世以为尸解得仙云”。他编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论述道教宗旨、哲理、仪式、方法的著作《抱朴子·内篇》,是道教理论的奠基人之一。在论著中,他尚有《登涉》专篇,对登山涉水的法术作了阐述。据《金陵玄观志》记载,葛洪仙游赣州兴国时(今江西兴国),“见山灵水秀,遂结庐筑坛,凿池洗药,留下《洗药池诗》一首:“洞阴□□,风佩清清。仙居永初洗药。”

陆修静是道教史上一代宗师，道教的基本理论著作，如《道藏》的《三洞部》（《洞真部》、《洞神部》、《洞玄部》）编撰与其相关。经他努力道教“述科定制，渐见绪端”，使庞杂纷纭的道教组织，道教戒律、斋醮仪式、神仙家谱开始整齐划一。这位道教史上的一代宗师是位大仙游家。他云游四方，访遍了巴山蜀水、蛮荆瓯越。直至晚年，道隐庐山金鸡峰简寂观，他仍游兴勃然，跟住在庐山东林寺的名僧释慧远、住在庐山山麓栗里村的诗人陶渊明，交游往来，同游同乐。陆修静如此热衷仙游，他的门人孙某便干脆将自己名字叫孙游岳了。

陶弘景是孙游岳的弟子。《南史·陶弘景传》中记云，他“幼有异操，年四五岁，恒以荻为笔，画灰中学书。至十岁，得葛洪神仙传，昼夜研寻，便有养生之志。谓人曰：‘仰青云，睹白日，不觉为远矣。’”“又说他‘善琴棋，工草隶’。且精通五行、风角星算、山川地理、方图产物、医术本草。不到二十岁便在朝廷里当上了诸王侍读。齐永明十年辞职，隐居句容县句曲山的华阳洞，‘自号华阳陶隐居’，‘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，无不前以谘询。月中常有数信，时人谓为山中宰相。’梁天监四年（公元505年），移居积金东涧。”大同二年（公元536年）卒，时年八十一。颜色不变，屈申如常，香气累日，氛氲满山”陶弘景是继葛洪、陆修静之后，又一位道教领袖。著有《真诰》阐发道教基本理论，《真灵位业图》建立层次分明的道教神谱，《养性延命录》讲述道教养气长生法术。他炼飞丹“色如霜雪，服之体轻”（《南史·陶弘景传》）他铸剑、铸刀“其一善胜，一名威胜，并为佳宝。”（《南史·陶弘景传》）他造浑天象“高三尺许，地居中央，天转而地不动，以机动之，悉与天相会”（同上）他研制中草药，“考校名类，莫不悉该”（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》）时人赞他：“张华之博物，马钧之巧思，

刘向之知微，葛洪之养性，兼此数贤，一人而已”（肖纶《陶隐居碑铭序》）后人更誉为“玄中之董狐，道家之尼父”（贾嵩《华阳隐居传序》）他又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山水小品，如《与谢中书书》：“山川之美，古来共谈。高峰入云，清流见底。两岸石壁，五色交辉。青林翠竹，四时俱备。晚雾将歇，猿鸟乱鸣。夕日欲颓，沉鳞竞跃。实是欲界之仙都。自康乐以来，未复有能与其奇者。”陶弘景文化上的成就，与其仙游密切相关。他是一位南朝出类拔萃的仙游大家。《南史·陶弘景传》说他受学孙游岳始，即“遍历名山，寻访仙药，身既轻捷，性爱山水，每经涧谷，必坐卧其间，吟咏盘桓，不能已已，”他曾说“吾见朱门广厦，虽识其华乐，而无欲往之心。望高岑，瞰大泽，知此难立止，自恒欲就之。”又说他“特爱松风，庭院皆植松，每闻其响，欣然为乐。有时独游泉石，望见者以为仙人。”归隐四十余年，仙游坚持不懈，自感乐趣无穷，“山中何所有？岭山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寄君”（《陶隐居集·答齐高帝诏问山中何所有》），并十分有益身心健康，《南史·陶弘景传》云：“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，自隐处四十许年，年逾八十而有壮容。”

综上所述，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，“玄游”、“仙游”的兴起，已充分地说明，魏晋南北朝人，早已摆脱了人对自然比德的传统观念，即以自然比德的时代已经过去；而是进入了一个有与自然亲近的时代，人们真正去发现、追求自然原有的美，并寄情、寄理于自然。从历史发展的横向看，“玄游”、“仙游”的兴起，也雄辩地证明，当西方人还沉醉于宗教神学、对自然蒙上浓重的神秘色彩时，中国人却早已去揭示自然美、享受自然美、运用自然美。西方人是用宗教神学的观念解释自然；而中国人即在“玄游”、“仙游”过程中，真正认识和亲近了自然，并着力去表现自然。